

#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

## ——伊朗民族矛盾的产生与演变

李 鹏 涛

**内容提要** 伊朗当代民族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主要是在巴列维王朝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在伊朗现代化过程中巴列维王朝所采取的措施的不平衡性,使得波斯人与非波斯人的社会与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加剧了民族矛盾。

**关键词** 伊朗 民族关系 巴列维王朝 波斯主义

民族关系不和谐以致引发激烈的民族矛盾,是当今伊朗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伊朗的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和阿塞拜疆人居多的省份多次发生民族骚乱,这不仅影响了伊朗社会的稳定,而且威胁到伊朗的国家安全。对于伊朗的民族矛盾,很多西方学者将其完全归咎于当代伊朗的民族政策,<sup>1</sup>这显然有失公允。本文认为伊朗民族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主要是在巴列维王朝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并在伊朗不平衡的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剧。

### 一、“马赛克”社会中的民族关系格局

伊朗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伊朗西南部就建立了一个名为“埃兰”(又译“依兰”)的国家。公元前9—8世纪,迁移到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先后建立了米底(又译米堤亚)王国和波斯王国,此后雅利安人逐渐同本地土著居民同化、融合,改变了该地区的语言与文化,同时“改变了伊朗的民族构成,造就了伊朗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原生态的民族文化”,<sup>④</sup>从而奠定了伊朗作为一个独特文明单元的基础。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波斯帝国的盛极一时,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的盛行,都促进了独特的伊朗文明的形成。

近代以来,波斯王国<sup>④</sup>同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阿富汗之间先后发生过战争,这也使得伊朗人的领土认同观念逐渐得以形成,“‘封闭的边疆’在伊朗历史上第一次使得不同民族背景的人们联合在了明确的主权统治之下”。<sup>④</sup>

伊朗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早在伊斯兰教传播到伊朗之前,这片土地上就一直生活着不同的民族,而且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居住地相对集中、各民族居住地之间相对分离的民族分布格局。例如,波斯人是伊朗民族的主体,主要居于中央平原;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在伊朗西部和西北部的扎格罗

<sup>1</sup> AbbasWilliam Sanji “Ethnic Tensions Could Crack Iran’s Firm Resolve against the Wor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vol. 98, issue 128, 5/30/2006, p. 9; Michael Rubin, “Domestic Threats to Iranian Stability: Khuzestan and Baluchistan”, *Jerusalem Issue Brief*, vol. 5, no. 9, 11/13/2005.

<sup>④</sup> 李铁匠:《大漠风流:波斯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sup>④</sup> 波斯王国于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为行文方便,以下均称“伊朗”。

<sup>④</sup> Firoozeh Kashani-Sabet “Fragile Frontiers: The Diminishing Domains of Qajar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9, 1997, p. 227.

斯山脉地区;土库曼人主要生活在北部地区;俾路支人主要居住在东南部地区……各民族不仅在地理分布上不同,而且存在着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差异。例如,波斯人讲波斯语,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库尔德人讲库尔德语,主要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不过克尔曼沙阿(即巴赫塔兰)地区的部分库尔德人则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土库曼人讲土库曼语,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俾路支人的语言近似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语,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阿拉伯人讲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等等。

在伊朗传统社会中,各民族之所以处于一种相互分隔的状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伊朗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境内少数民族的控制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正如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所说,在农业社会中,“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对促进整个社会层次上的文化同类型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是课税、维持和平一类的事情,对促进臣民社群之间的水平交流没有兴趣”。<sup>1</sup> 无论是尊奉琐罗亚斯德教的还是尊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各个伊朗王朝基本上都是如此,只要各民族效忠王朝并缴纳赋税,其生存就不会面临威胁。

其二,部落力量在伊朗历史上一直非常强大,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保存。伊朗的土库曼人、卡什凯人(Kashkai)、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等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口都归属于部落。<sup>④</sup> 由于很多部落几乎是完全自治的,而且拥有一定的甚至较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中央政府很难对其加以控制。尤其是伊朗境内多山的地形,交通极为不便,使得地方分权、自治成为一种常态,只有少数王朝和时期(如塞尔柱王朝、蒙古人统治时期和萨法维王朝等)实现了较高级别的中央集权。游牧民族更对中央集权不感兴趣,11—19世纪,游牧部落的内部事务基本上由自己处理,在集权时期也只是向中央政府缴纳贡赋,并在形式上由统治者确认其部落首领的地位而已。在伊朗历史上部落力量一直很强大,从布维希王朝直到恺加王朝(又译卡扎尔王朝)都是依靠部落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其三,由于当时人口迁移和信息流通的程度较低,所以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有限。在传统的伊朗社会中,“大多数乡村、部落和城镇在总体上是孤立的,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己生产和消费所有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sup>(四)</sup> 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等联系,但是相互之间深入的交流较少,所以受其他民族影响的程度较低。直到19世纪末,伊朗各民族的经济仍然是地域性的,真正全国性的经济实际上并不存在。<sup>¼</sup>

这种同一政治共同体之内各民族相互隔离的社会状况并非仅仅出现在伊朗,而是古代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厄内斯特·盖尔纳曾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乌里玛’,即学者—律师—神学家松散的行会,他们在道德上统治着传统的穆斯林世界,他们既超越政治,又超越族裔,不附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属于任何‘民族’;另一方面,信奉圣祠和神圣血统的民间伊斯兰世界具有次生种族群体、次生政治的性质,它既服务于又加强着活跃的地方自卫和自治单位(即部落)。”<sup>½</sup>

有学者用“马赛克”理论(Mosaic Theory)来阐述传统伊斯兰社会的这种特征。<sup>¾</sup> 在伊朗古代的这种“马赛克”社会中,波斯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政府倾向于鼓励

<sup>1</sup>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sup>④</sup> Nikki R. Keddie, *Modern Iran, Roots and Results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4.

<sup>(四)</sup>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1.

<sup>¼</sup> 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1983, p. 212.

<sup>½</sup>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0页。

<sup>¾</sup> Ilia F. Hark, “The Ethnic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 1972, pp. 304–312.

而非消灭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所以少数民族很少因为文化差异而遭受歧视。伊朗各民族之间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伊朗关于种族、语言和族群的冲突……几乎是到20世纪,当伊朗放眼看欧洲,并通过所观察到的欧洲景况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时才产生的。”<sup>1</sup>

## 二、“波斯主义”的伊朗民族国家

伊朗地处西亚、中亚和南亚的“十字路口”,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欧洲大国竞相争夺的目标。从18世纪中叶起,伊朗王朝败落,内乱不已,外敌纷纷入侵。国内几十年的战乱使伊朗变得贫弱不堪,而英国、沙皇俄国则趁机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朝伊朗推进,企图将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两国签订了瓜分伊朗的条约:伊朗北部归沙皇俄国,伊朗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西方思想也传播到伊朗,并对伊朗本土文化产生了极大冲击。在当时传入伊朗的西方思想中最具号召力的是宪政主义和民族主义。然而,立宪运动不仅没有给伊朗带来稳定,反而加剧了其国内政局的动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伊朗更是处于政治解体的边缘。如果说社会平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伊朗知识分子的主要诉求,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知识分子更多关注的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创建,政治集权化和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伊朗要想维护国家主权,免受战乱和外敌入侵之苦,就必须实现内部统一,构建一个崭新的“伊朗民族”。这种民族构建不仅是政治地域意义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必须实现内部的文化整合。<sup>④</sup>建立民族国家是当时伊朗社会的普遍愿望,也反映了伊朗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进展。

但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需要较高度度的民族同质性,因而“捏造”历史、“编造”神话在一些国家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伊朗来说,由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同对于现状的自卑以及对于过去的自豪有关,同欧洲在当代的强盛、成就与威望有关,也同曾经征服并统治过伊朗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衰落、贫弱和落后有关”,<sup>④</sup>因此,波斯人与雅利安人之间的历史联系被突出强调(这也是礼萨汗<sup>¼</sup>政府在1935年将国名由波斯改成伊朗的主要原因),伊朗历史被改写以适应于雅利安主义或波斯主义理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被认为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并被谴责为致使伊朗落后的罪魁祸首,而只有波斯文明才是伊朗复兴的希望所在。

就这种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言,它并非伊朗境内所有居民的“伊朗主义”(Iranianism)的爱国感情,而是波斯人的“波斯主义”(Persianism)。当时一位著名的报纸主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我所说的伊朗国家统一是指居住在伊朗现有领土内各民族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上的统一。……领土完整意味着必须确立波斯语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服装、风俗以及诸如此类的地区差异必须消失,地方首领必须被消灭。库尔德人、卢尔人(Lur)、卡什凯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等不应该因为穿着或语言方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看来,除非伊朗在习俗、服饰等方面统一,否则我们的政治独

<sup>1</sup> Homā Kabuzian, *Iranian History and Politics: The Dialectic of State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129

<sup>④</sup> 当时德黑兰出现了很多宣扬民族主义的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未来》(Ayandeh)。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共同主题是:自从阿拉伯人入侵以来,波斯处于持续衰落之中,而贪婪的俄、英帝国主义对波斯民族的苦难更是雪上加霜;要想洗刷帝国主义带给波斯民族的耻辱,唯一的办法是唤醒并拯救民族情感和意识,因此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该刊物尤其主张实现文化整合,鼓吹消除各种方言,强调共同语言文化。参见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 124

<sup>④</sup> Homā Kabuzian, *Iranian History and Politics: The Dialectic of State and Society*, p. 129.

<sup>¼</sup> 他在1925年推翻卡扎尔王朝自立为王以后,改称“礼萨沙”(Riā Shāh Pahlāw),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其为“礼萨汗”。

立和领土完整就一直会受到威胁。”<sup>1</sup>

伊朗的民族主义以“波斯主义”这种波斯文化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霸权的形式出现,首先反映了波斯文明的活力以及它在伊朗历史上的重要性,这同时也是由“马赛克”式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各民族相互隔绝的状况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社会情况下实现一致性,民族主义是模具,然而社会现状却是马赛克式的。既然各民族相互分割的状况已经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所以民族主义就必须严重依赖于强制性的而非建构性的措施来实现统一与融合”。<sup>④</sup>

“波斯主义”对于伊朗社会内部的整合起到了一定作用。“虽然‘伊朗’在世纪之交还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却是一个由日益增强的、极具说服力的想象所黏合在一起的共同体。”<sup>⑤</sup> 1921年,一位游历伊朗的外国观察家写道:“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目前似乎存在着远比我以前所知道的更有效、更具凝聚力的公众舆论,它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sup>1/4</sup> 但是,这些“编造”的神话、“捏造”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后果。这种在波斯民族文化霸权主导下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声称伊朗民族就是从波斯人这一主体民族成长而来的,从而混淆了现代民族与历史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区别,掩盖了历史事实,也埋下了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隐患。

礼萨汗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就是这种“波斯主义”的体现。1921年,礼萨汗发动政变而上台任陆军大臣并掌握了国家的实权,1925年他推翻了恺加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自立为王。礼萨汗推行了一系列统一国家的改革措施,促进了伊朗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从而标志着伊朗民族国家的构建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实现政治集权化是礼萨汗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礼萨汗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原则,用武力消除了地方部落势力,而且禁止地方部落首领在本地区担任官职。礼萨汗政府还通过修建公路、铁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来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伴随着伊朗中部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金融机构和官僚机构也发展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礼萨汗政府实施的许多措施导致各民族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波斯人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其他民族。同时,礼萨汗在文化上进一步深化“波斯主义”。伴随着政治集权化和“波斯主义”的高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对非波斯语民族的歧视。“在现代,语言已经远比以前重要得多。在前现代政治中,即便确实存在主体语言,一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讲一种同主体民族不同的语言也并不是什么问题。”<sup>1/2</sup> 波斯语言和文化在社会和法律层面取得了优势地位,波斯语成为学校中惟一的授课语言。礼萨汗政府不允许出版非波斯语的书籍和报纸。同时,为了取得更大程度的民族一致性,礼萨汗命令建立一个名为思想发展局的政府部门,负责教育年轻人树立对于国家的认同观念。这些政策遭到少数民族的憎恨和仇视,并对当局竭力培育的“伊朗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它并没有为波斯语言和文学取得什么,却使非波斯语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将自己视为被歧视、被压迫的对象”。<sup>3/4</sup>

在经济方面,礼萨汗政府极力推动经济工业化,却面临着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伊朗虽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油田却一直被西方公司控制着,政府所获石油收入寥寥无几。直到 1933 年重

<sup>1</sup> Touraj Atabaki “Ethnic Divers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Iran: Domestic Harmony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Iranian Studies* vol 38 no 1 March 2005 p 31.

<sup>④</sup> Hiyā F. Harik, “The Ethnic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 1972 p 310.

<sup>⑤</sup> Ali M. Ansari *Modern Iran since 1921, The Pahlavis and after*,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03, p 16

<sup>1/4</sup> 转引自 Ali M. Ansari *Modern Iran since 1921, The Pahlavis and after*, p 32

<sup>1/2</sup> Nikki R. Keddie *Iran and the Muslim World,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9

<sup>3/4</sup> Homā Kabuzian *Iranian History and Politics: The Dialectic of State and Society*, p 130.

新谈判石油开发收入分配以后,石油收入才成为伊朗发展工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此之前,伊朗政府推行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税和关税。

这一早期的工业化对伊朗的民族关系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一,工业主要分布于中央平原地区和北方地区。因此,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主要是在波斯人聚居的地区,非波斯人居住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获益微薄,非波斯人主要是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劳动力;第二,过分强调工业发展,忽视了农业发展,但非波斯人主要依赖农业为生,从而人为地加剧了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由于这一时期伊朗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还不突出。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伊朗进入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一差距迅速拉大。

### 三、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与民族矛盾的加剧

由于礼萨汗在二战期间与法西斯德国关系密切,1941年反法西斯盟军进入伊朗后,他被迫退位,由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巴列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基本上重新确立了独裁统治。1966—1976年是伊朗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到1976年,伊朗人均年收入从1966年的500美元增至1857美元,政府年收入增至206亿美元;1975年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达到240万人,1976年大型工业企业增至5432家;城市化速度也加快了,20世纪50年代伊朗总人口中城市居民仅占31.4%,而到1976年城市居民所占比重增至47%;伊朗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1956年伊朗全国10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仅为14.9%,到1976年则上升为47.7%。<sup>1</sup>

以上这些数据显示了伊朗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巴列维王朝所推行的现代化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国家将资金和技术等主要投入了波斯人聚居的中央平原地区,而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利益。1966—1976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波斯民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的时期。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由于巨额的“石油美元”为伊朗发展经济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巴列维政府发展经济所需资金已经由依靠国内税收转向主要依靠石油收入,国家无需向社会抽取资金,也就不会对社会产生依赖性,政府在制订经济和社会政策时就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1972—1973年度的国家预算中,占全国总人口的20.7%的中部省份得到预算总额的32.7%;东阿塞拜疆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却只得到预算总额的4.8%;1974年,14.3%的农业贷款流向了中部地区省份,而俾路支斯坦省则只得到0.7%。<sup>④</sup>

其二,长期以来,伊朗在发展经济中片面重视工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列维政府强调工业化是伊朗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主张在伊朗经济计划中居于主导地位,尤其在石油收入剧增的情况下这一主张更是得到强化。由于简单地将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生产,所以伊朗政府忽视了农业部门,从而忽视了以农业为生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央政府因为有了大量石油收入而不再依赖地方的税收,相反,许多地方却要依赖中央政府来获得石油利益。

其三,外资在伊朗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1968年有1563家外国公司在伊朗投资,到1976年,在伊朗投资的外国公司猛增至3976家。<sup>④</sup>由于这些外国公司都选择在发展基础较好、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中部地区投资或设立企业,使得中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却没有从中得益,仍处于落后状态。

<sup>1</sup> Mohsen M. Milani,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 65–67.

<sup>④ ④</sup> 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1983, p. 221, 222.

巴列维政府的这种不平衡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忽视非波斯人利益的做法来发展波斯人的利益。以下三个表格分别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职业结构和城市化、识字率、贫穷家庭比例,来分析比较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不同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到,从 1966 年到 1976 年,伊朗各民族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了。1976 年,伊朗全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 36.1%,而波斯人聚居的中部省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当地全部劳动力的 13.8%,这说明波斯人在农业部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表 1 1966、1976 年伊朗的职业结构和城市化比较 (%)

但俾路支人的这一比重是 57.1%,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这一比重也很高。从城市化程度来看,1976 年,伊朗全国的平均水平是 46.8%,非波斯人的城市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克尔曼沙阿的城市化水平稍微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则大大高于全国水平。

省份与民族	农业人口		城市人口	
	1966 年	1976 年	1966 年	1976 年
中部 (波斯人)	19.2	13.8	70.3	79.7
东阿塞拜疆 (土耳其人)	50.2	41.6	29.0	36.3
西阿塞拜疆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	61.0	53.9	25.5	32.1
克尔曼沙阿 (库尔德人)	55.2	40.7	35.4	43.4
库尔德斯坦 (库尔德人)	69.0	51.6	16.5	24.2
锡斯坦 - 俾路支斯坦 (俾路支人)	66.6	57.1	14.4	24.5
伊朗全国	46.2	36.1	39.1	46.8

资料来源: 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1983, p. 215.

表 2 1966、1976 年不同省份和民族的识字率比较 (%)

在受教育方面,各民族之间的不平衡也没有改善。从表 2 中可以看到,非波斯民族处于不利地位。1976 年,全国 6 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为 47.5%,中部省份的这一比例是 66.1%,其他地区的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波斯人的识字率。

省份与民族	1966 年	1976 年
中部 (波斯人)	49.6	66.1
东阿塞拜疆 (土耳其人)	20.5	36.3
西阿塞拜疆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	19.8	38.1
克尔曼沙阿 (库尔德人)	25.1	42.2
库尔德斯坦 (库尔德人)	14.3	30.0
锡斯坦 - 俾路支斯坦 (俾路支人)	14.9	29.7
伊朗全国	29.4	47.5

资料来源: 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1983, p. 216.

表 3 1973 年伊朗贫穷家庭比例 (%)

表 3 显示了 1973 年伊朗不同地区与民族的贫穷家庭比例。当时,全国贫困家庭总比例是 41.7%,中部省份贫困家庭比例是 21.0%,俾路支人聚居区的这一比例是 77.0%,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聚居区的这一

省份与民族	总计	城市	农村
中部 (波斯人)	21.0	12.2	56.8
东阿塞拜疆 (土耳其人)	32.0	22.0	37.7
西阿塞拜疆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	35.0	26.8	38.8
克尔曼沙阿 (库尔德人)	38.0	10.1	59.3
库尔德斯坦 (库尔德人)	30.8	23.9	33.9
锡斯坦 - 俾路支斯坦 (俾路支人)	77.0	47.7	83.0
伊朗全国	41.7	25.4	56.2

注: 伊朗政府的家庭支出报告将总消费额低于 60000 里亚尔 (约合 857 美元) 的家庭界定为贫困家庭。

资料来源: 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1983, p. 218.

比例也远高于波斯人。如果分农村和城市来考察,其结果也大致相同。俾路支和库尔德斯坦的城市贫困家庭比例最高,波斯人居多的中部地区最低。农村贫困家庭比例,俾路支人最高,库尔德和土耳其人居中。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伊朗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并没有在各民族之间公平分配,实际上,经济发展反而扩大了波斯民族与非波斯民族之间的社会鸿沟和经济差距。“德黑兰成为经济生活和工业的中心,边远的少数民族受到中心地区的行政管理者和企业家的经济忽视和政治控制……库尔德人在伊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被忽略了,卢尔人、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要比库尔德人更穷,非部落的阿塞拜疆(地区)也失去了以往的经济重要性。”<sup>1</sup>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伊朗当今所面临的民族矛盾更多地是在巴列维王朝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在传统的“马赛克”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程度较低,少数民族的文化得到尊重。然而,近代以来伊朗构建民族国家是在波斯人的文化霸权下进行的,文化差异使得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遭受歧视,这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与疏离。到20世纪60—70年代,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和以波斯人聚居的中部地区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经济财富和社会资源无法在各民族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并且造成波斯民族与非波斯民族之间已有的社会鸿沟和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由此,每当伊朗出现政局动荡,民族矛盾就会凸显出来,少数民族就会要求自治权和公平的政治、经济权利,阿塞拜疆地区于1920年、1945—1946年和1979年发生的三次起义,以及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地于1979年发生的骚乱就是突出表现。

发展绝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过程,它意味着必须消除各种歧视与压迫。面对巴列维王朝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当今伊朗政府必须审慎对待。只有通过推进政治结构改革,使各民族“以个人为基础或群体比例代表的方式,通过平等地获得经济机会、政治参与或文化地位”,<sup>④</sup>以确保个人和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方能消除产生民族矛盾的根源。

**Abstract** Ethnic conflict in Iranian aris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the uneven modernization of Pahlavi Dynasty. In the traditional mosaic society cultural divers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was encouraged.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Iranian state is under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Persian culture, which results in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Iran.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under Reza Shah and Pahlavi widens the socio-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Persian group and the non-Persian minorities and so deepens the ethnic conflict.

(李鹏涛, 讲师,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金华, 321004)

[责任编辑: 丁克定]

<sup>1</sup> Nikki R. Keddie, *Iran and the Muslim World,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 131, 133.

<sup>④</sup> Touraj Atabaki, “Ethnic Divers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Iran: Domestic Harmony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Iranian Studies*, vol. 38, no. 1, March 2005, p. 44.